

还会有下一任达赖喇嘛吗？

范德康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达赖喇嘛应该是藏文化区域内最重要和最知名的活佛转世制度，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但喇嘛（意为“上师”）转世观念本身的渊源则要早得多，转世喇嘛的存在是所有藏传佛教流传地区的一个共同特征：印度北方；尼泊尔北部地区；中国的西藏自治区；云南省西北部及大部分四川省、青海省和甘肃省的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 (Kalmykia) 共和国与布里亚特 (Buryatia) 共和国等。

基于对佛教思想的特定诠释，有关西藏喇嘛转世观念的证据最早出现在12世纪。藏语中关于这种转世的术语是“祖古” (tulku)，其含义大概为“对于觉悟的神奇展示”。在明朝，这种观念被翻译为汉语中的“活佛”，其实是被误以为祖古是佛陀的觉悟经历的实际呈现，或者说佛陀本身。事实上，被认定为祖古的人基本等同于佛陀 (buddha)，被称为菩萨 (bodhisattva)。虽然菩萨的觉悟境界还没有完全达到佛陀的程度，却在不可逆转地向佛教修行的最终精神目标前进：成佛。

达赖喇嘛的名号始于索南嘉措 (Sonam Gyatso, 1543 - 1588)，他是西藏大型寺院哲蚌寺 (Draypung) 的住持，是第三代转世上师。索南嘉措于1578年接受蒙古首领俺答汗

(Altan Khan) 的邀请，到青海与他会面后，俺答汗随即把“达赖喇嘛”的蒙古名号授予他，意为“如大海般包容一切的上师”。他由此成为第一位被称为达赖喇嘛的转世活佛。

达赖喇嘛制度具有宗派性质，属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 (Gelugpa school)，位于如今的拉萨市。在佛教历史早期某个时间点，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世系被推算到源自观音菩萨 (Avalokiteśvara)，是印度南方的普陀山 (Mount Potala) 之巅自“无始之始”以来的一位神灵。观音菩萨代表佛陀的开悟、慈悲的一面，与著名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Om maṇi padme hūṃ) 有关，还涉及其他多种修行活动。对信徒而言，某些圣山据信是可移动而非静态的事物，因此第五世达赖喇嘛 (1617-1682) 建造居所的山也被称为“布达拉” (Potala)。

达赖喇嘛并不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唯一转世传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 (Karma Kagyüpa school) 中黑帽系的首领大宝法王 (Karmapa)，以及藏传佛教其他派别分支中的许多显要喇嘛也都被看作这位菩萨的转世。喇嘛被当作观音转世的观念与如下历史密切相关：11世纪中叶时，部分西藏人把观音菩萨认定为藏族地区的护佑菩萨，而另一位重要菩萨一文殊菩萨 (Mañjuśrī) 一则成为中国的护佑者。实际上，被不同教派视为特定神灵化身的任何西藏喇嘛都可能被当做观音菩萨的转世。

索南嘉措再也没回到西藏中部的寺院本部，而是应多家寺院以及西藏和蒙古贵族之邀，到中国西北和康巴地区（东部藏区）游历。索南嘉措去世时，寻找继承人的问题出现了。尽管未有清楚记录到他们最后是如何找到继承人的，但我们知道负责寻找和确认索南嘉措继承人的是其庄园的管家。在寺院主持放出消息称索南嘉措的妻子刚诞下一名男婴之后，他访问了控制止贡寺 (Drigung monastery，噶举派中的止贡派的中心) 的家族。

除格鲁派之外，藏传佛教的其他主要派别并不要求主持保

持独身。这项规条对转世喇嘛同样有效，当然有些人会自愿选择独身。（格鲁派的转世喇嘛依照规则是独身僧侣。）索南嘉措的管家并不相信止贡寺家族推举的候选人，而是希望或许可以把哲蚌寺的转世传承严格限制在格鲁派以内。因此，当他听说俺答汗的孙子也有个新生儿子时，他便到访大汗的营地，并认定那个孩子是索南嘉措的传人。这便是无所作为的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 1589–1617），是首位非藏族血统的西藏转世喇嘛。

随着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到来，这一组织变成了政治机器以及所有转世活佛体制中最为富有的一支。这位活佛建立了“噶丹颇章”王朝（Ganden Podrang）这个神权政体。无论盛衰，该政府都由达赖喇嘛领导。在大约三个世纪中，噶丹颇章一直控制或强势影响着藏文化区域的大部分地方，直至其于1959年衰落。

藏区经济在1959年之前是由寺院和土地贵族掌握大部分财富，主要由土地与牲畜组成。（此外，土地贵族也往往是寺院及其庄园的所有者。）除农场利润外，财富还通过敬献礼物的形式交给转世喇嘛和寺院，以换取他们对高深修行的教导或开悟。这种敬献和慷慨观念，是在佛教于8世纪开始进入藏区的时候，从印度半岛和中国引入的。最终，藏传佛教彻底变成了印度式，即使依然可以察觉到中国佛教的某些痕迹。

佛教中的敬献概念大约是指预期的馈赠，作为信徒要求教化或活动的回报。要求教导或开悟的人愈富有，对敬献礼物的期望就愈高，通常对礼物的预期大小也愈大。敬献可以是金钱，但更多包含土地和牲畜等财物。所有这些敬献都被详细记录、登记和存档；随着敬献礼物逐渐增加，还需要管理团队来监督和处理。由此产生了“拉卜楞”（labrang）的概念，是主要负责某位转世喇嘛所属的转世序列体制的官僚机构。某些大型寺院可能有若干拉卜楞，取决于当地居住了多少位转世活佛。

西藏的记录显示，13世纪的蒙古统治者忽必烈大汗把西藏

中部地区授予他的老师八思巴喇嘛 (Lama Phagpa)，作为对其精深佛法开悟的回报，同时还授予他“国师”和“帝师”的称号与官职。很久之后，当第五世达赖喇嘛于1652和1653年前往北京拜访年轻的清朝顺治皇帝时，他走遍有着众多藏族和蒙古族人口的中国西北大片游牧地区。他在自传中描述，基于自己是观音菩萨转世的理念，他通过召唤观音的法事来提供教化和指导，累积起庞大的财富。这意味着他能够以之为自己建立起坚实的忠诚度。除达赖喇嘛制度形成的权势和财富外，通过延续至今的相当于个人崇拜的方式，他还凝聚起了个人权力。如果不是因为这位活佛，达赖喇嘛制度或许只是藏传佛教中的各种社群和宗派间类似制度与转世世系中的一支而已。

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大约十万名西藏人于1959年离开数百万藏族同胞，逃到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之后，他一直是中国和其他地方关于西藏合法地位、1959年后的西藏人权状况及其他议题的众多讨论的话题人物。某些是资讯丰富且具有价值的对话，但大多数充满宣传论调，要么支持达兰萨拉 (Dharamsala，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的大本营)，要么倾向北京方面。其他对话偶然带有超现实气氛，与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现实和达赖喇嘛及其政府扮演的角色无关。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疑问——是否独立于中国，以及何时取得独立——还有西藏到底应该包含哪些区域，什么是达赖喇嘛的噶丹颇章政权的控制范围等，自1959年以后都被提起。这些问题相当复杂，并不容易回答。

自几十年前开始，现任达赖喇嘛经常提到他或许是最后一任。之前有过转世活佛序列逐渐消亡的其他案例。原因有很多：缺乏有魅力的领导人、教派之间和内部的竞争导致内乱乃至寺院庙宇的破坏，以及缺乏寻访继承人的兴趣等。有时转世传承被勒令消失，如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转世活佛序列，由于卷入1792年的廓尔喀战争 (Gurkha War)，在当时的活佛被杀或自杀后，达赖喇嘛的政府便禁止其传承。这一禁令维持到1963年，被西藏流亡政府取消。第十六世大宝法王 (Karmapa

XVI, 1924–1981) 恢复了转世制度，并承认自己的侄子米庞确吉罗佐 (Mipam chokey lodro, 1952–2014) 为红帽系转世活佛。

公元7世纪的伟大印度佛教哲学家法称 (Dharmakirti) 提出，菩萨转世的主要愿望和目标是由于大慈大悲驱使一个人回到苦海，回到日常生活轮回，去帮助其他人寻求摆脱劫难。通过无数的生命轮回，菩萨（与佛陀）的慈悲胸怀已如此强烈，使其代代延续。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为何现任达赖喇嘛会宣称自己将是最后一任，当然，除非这个决定是基于只有他个人才清楚的动机。诚然，他完全可能是最后一位执掌达赖喇嘛官职的人，但毫无疑问，从佛教的世界观来看，与我们所有人一样，他还将以某种方式重生。